

藍星詩社對現代詩發展的貢獻 以五十年代三次論戰為探討中心

侯作珍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藍星」和「現代派」、「創世紀」詩社，是推動台灣現代詩發展的三大力量，也是現代詩運動的共同參與者。

現代詩運動從一九五六年進行至一九六九年，前有紀弦的「現代派六大信條」為宣言，後有「創世紀」詩社的超現實主義作實驗，欲藉現代詩的提倡，達成新詩自五四以來在思想內容與藝術技巧上的革新。

而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之間，爆發的三場現代詩論戰，對現代詩的推動和發展亦有很大影響，「藍星」詩社即在論戰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本文以「藍星」詩社在論戰中的角色分析，來探討其對現代詩發展所起的作用及貢獻。

關鍵詞：現代詩、「藍星詩社」、現代詩論戰、現代主義

一、前言

現代詩在五十年代台灣的推動與開展，是由紀弦「現代派」發其端，並由「藍星」和「創世紀」詩社透過宣言和論戰的方式，互相影響而共同推行的。這場盛大的「現代詩運動」，三大詩社都參與其中¹，對現代詩的發展作了貢獻。

林亨泰曾將現代詩運動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從「現代派」宣告正式成立，提出「現代派六大信條」為綱領，到《現代詩》出刊二十三期後的欲振乏力為止，時間是從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後期則由《創世紀》十一期的重新改版，開始提倡超現實主義，到二十九期的暫時停刊，時間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前後兩期總共有十三年左右。前期以「現代派」為中心來推動，為期約三年；後期以「現代派」與「創世紀」匯流後所共同推動，為期約十年²。這是以主要的領導詩社來作現代詩運動前後兩期的劃分，但卻無法顯示出現代詩論戰在此運動初期所產生的激發力量，以及「藍星」詩社發揮的作用。

現代詩論戰在五十年代後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爆發了三場，第一場是「現代派」與「藍星」的論戰，另外兩場則是「藍星」與來自詩壇外部的論戰。透過這三場論戰對現代詩的反覆質疑與辯難，才使現代主義得以深植詩壇，開創現代詩運動後期以「創世紀」為主要推動力量的現代主義全盛時期。在這三場論戰中，「藍星」詩社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雖然「以鼓動風潮、創造時勢而論，其影響顯然不如『現代派』與『創世紀』」³，但是從「藍星」詩社在現代詩論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卻可了解「藍星」詩社對台灣現代詩發展所起的作用及貢獻，此為本文論述之重點⁴。

¹ 影響五十年代台灣現代詩發展最重要的三個詩社與詩刊，就是「現代派」、「藍星」與「創世紀」及其所發行的詩刊。相形之下，五十年代還有許多詩刊因壽命不長與缺乏影響力，故較少被論及，如《旭日新詩》《青蘋果》（一九五四）《海鷗》（一九五五）《南北笛》（一九五六）《今日新詩》《噴泉》《東海詩頁》（一九五七）等十餘種，詳細資料可參見舒蘭：《中國新詩史話》第三冊十二章第一節「五十年代詩社詩刊」，台北：渤海堂文化出版，1998年。

² 見林亨泰：《現代主義與台灣現代詩》，《找尋現代詩的原點》，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4年，頁227。

³ 見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中外文學》第十卷第十二期，一九八二年五月，頁14。

⁴ 必須說明的是，關於五十年代現代詩論戰的探討與評析，相關論文已有多篇，例如蕭蕭：《五十年代新詩論戰述評》，《台灣現代詩史論》，文訊雜誌社出版，1996年；林淇瀟：《五十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靜宜人文學報》十一期，1999年7月；應鳳凰：《台灣五十年代詩壇與現代詩運動》，《現代詩學季刊》三十八、三十九期，2002年3月、6月，皆有其切入視角，述及了論戰

二、「藍星」詩社成立概況

「藍星」詩社成立於一九五四年三月，發起人是夏菁、鄧禹平、余光中、覃子豪和鍾鼎文。「藍星」詩社成立之初，並無明確的組織和路線，後來因反對紀弦「現代派」的部分主張，而與「現代派」展開抗衡。自從一九五三年二月，紀弦創辦《現代詩》季刊，又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台北成立「現代派」，以《現代詩》作為現代派詩人群的共同雜誌，並在同年二月出版的第十三期《現代詩》上，刊登了「現代派消息公報第一號」、「現代派的信條」、「現代派信條釋義」及社論「戰鬥的第四年，新詩的再革命」，正式開始現代詩的提倡後，一時之間加盟的詩人甚眾，在詩壇造成頗大的聲勢。「現代派」所標舉的六大信條，其中「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和「知性之強調」的主張⁵，就是「藍星」詩社批判的重點，引發了覃子豪和紀弦之間的現代詩論戰。余光中回憶當時的狀況說：

一開始，我們似乎就有一個默契，那就是，我們要組織的，本質上便是一個不講組織的詩社。基於這個認識，我們也就從未推選什麼社長，更未通過什麼大綱，宣揚什麼主義。大致上，我們的結合是針對紀弦的一個「反動」。紀弦要移植西洋的現代詩到中國的土壤上來，我們非常反對。我們雖不以直承中國詩的傳統為己任，可是也不願意貿然作所謂「橫的移植」。紀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為創作的原則，我們的作風則傾向抒情。紀弦要放逐韻文，而用散文為詩的工具。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反應不太一致，只是覺得，在界說含混的「散文」一詞的縱容下，不知要誤了多少文字欠通的青年作者而已⁶。

的主張、特色和影響。本文則是以「藍星詩社」為主體，看其在論戰中的表現，以及對現代詩發展的貢獻。

⁵ 現代派六大信條是：一、我們是所有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二、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三、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四、知性之強調。五、追求詩的純粹性。六、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

⁶ 余光中：「第十七個誕辰」，收於所著《焚鶴人》，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2年，頁187-188。

「藍星」詩社剛開始是反對「現代派」的，而覃子豪與紀弦的對立，也可追溯到《新詩週刊》時期。紀弦在創辦《現代詩》之前，曾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與鍾鼎文、葛賢寧合辦了《新詩週刊》，這是藉《自立晚報》副刊的型態出版的台灣光復後第一份定期詩刊。後來紀弦、鍾鼎文、葛賢寧相繼離開《新詩週刊》，由覃子豪接任主編，紀弦便另闢疆域，於一九五二年八月辦《詩誌》，僅一期而卒，又於次年二月辦《現代詩》。《新詩週刊》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停刊後，覃子豪於次年發起「藍星」詩社，創《藍星週刊》，以繼承《新詩週刊》的姿態自居，詩壇便大致分裂為「現代詩」和「藍星」兩股勢力⁷。

「藍星」走的是「自由創作」的路線，沒有統一的宗旨，也不宣揚任何主義，包容度頗大，但整體來說，它的立場較為傾向傳統的抒情主義路線，「藍星」的重要詩人余光中和吳望堯，剛開始都喜歡寫浪漫抒情的格律詩，頗有新月派餘風。相繼加入「藍星」的詩人有向明、蓉子、阮囊、黃用、張健、龔虹、周夢蝶、唐劍霞、方莘、王憲陽等人，羅門亦從「現代派」旗下轉投「藍星」陣營。而「藍星」出版的刊物之多，也為當時詩社之冠，首先是覃子豪於一九五四年六月借《公論報》的副刊版面創《藍星週刊》，在刊前語可以看到「藍星」創作的原則是：

藍星週刊的態度和新詩週刊的態度是一致的。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藍星的内容更健全，更充實，尤其要緊的，是我們的作品，不要和時代脫節：太落伍，會被時代的讀者所揚棄，太「超越」，會和現實游離。我們不寫昨日寫過的詩，不寫明日幻想的詩，要寫今日生活的詩，我們要揚棄那些陳舊的内容，與裝腔作勢的調子。要創造現實生活的內容和能表現這種內容的新形式，新風格⁸。

⁷ 覃子豪與紀弦在《新詩週刊》的對立肇始，可參見林淇瀟：五十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的分析。又根據麥穗的說法，認為《新詩週刊》稱得上是現代詩和詩刊在台灣的新傳者和開山者，戰後台灣最早的兩個詩社「現代詩」和「藍星」，都可說是《新詩週刊》分裂而成的，《新詩週刊》大部分主要作者，後來也大多成了兩大詩社的主要分子，如「現代詩」的紀弦、方思、蓉子、林泠、鄭愁予、林亨泰、李莎、楊允達等，「藍星」的覃子豪、鍾鼎文、夏菁、鄧禹平、黃騰輝等。見麥穗：現代詩的傳薪者——《新詩週刊》，收於《詩空的雲煙：台灣新詩備忘錄》，台北：詩藝文出版社，1998年。

⁸ 《藍星週刊》刊前語，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創刊，收錄於《文訊》12期，1984年6月，頁186。

相對於《現代詩》「太超越」的勢力，《藍星週刊》則主張創新風格但又不要太過前衛，確實較為溫和保守，不過「藍星」在新詩發表園地的拓展上卻頗為積極。一九五七年一月，覃子豪於《宜蘭青年》上開闢了《藍星》分刊，由朱家駿（朱橋）掛名主編。同年八月覃子豪編《藍星詩選》，至十月出了兩期專號：「獅子星座號」與「天鵝星座號」，因刊登現代詩論戰的文章而突顯其重要性⁹。主編《藍星詩選》後的覃子豪把《藍星週刊》交給了余光中接棒，余光中在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間，同時負責編輯《藍星週刊》、《文學雜誌》和《文星》的詩作欄，因此藍星詩人的作品也常常見諸於《文學雜誌》和《文星》這兩份「非專業詩刊」的綜合型雜誌上，覃子豪亦主編過《自由青年》的詩選欄，一時之間藍星同仁可發表作品的場地真是不勝枚舉，加上「藍星」的詩風側重抒情，予人的接受度較高，讀者可能比《現代詩》、《創世紀》等專業詩刊為多¹⁰。

一九五八年十月，余光中赴美讀書，《藍星週刊》停刊，《文學雜誌》詩欄交由夏菁主編，《文星》則交由覃子豪。同年十二月，夏菁主編《藍星詩頁》，後由覃子豪、余光中、羅門與蓉子、王憲陽輪流接編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停刊，是藍星系列中維持較久的刊物。一九六一年六月，覃子豪又編過四期的《藍星季刊》。一九六四年六月，羅門、蓉子主編《藍星年刊》，一九七一年再出一期。這麼多刊物的設立，或可視為詩壇勢力的一種象徵，但亦反映了「藍星」詩人自由和隨性的作風，因為這些刊物的延續性多半不足，短則數月、長則數年便告停刊。大致上來說，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十年之間，是「藍星」詩社的全盛時期¹¹。

雖然「藍星」詩社未標榜具體的主義，內部同仁也傾向自由創作，但在現代詩論戰中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且從反對「現代派」的主張轉變為接受現代主義，成為現代詩的推動者，一種「溫和的現代主義」便成了它往後發展的基調。

三、現代詩論戰與「藍星」詩人的角色

⁹ 分別為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刊登於「獅子星座號」，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羅門〈論詩的理性與抒情〉、黃用〈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刊登於「天鵝星座號」，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¹⁰ 余光中：〈第十七個誕辰〉和洛夫：〈詩壇春秋三十年〉都提到「藍星」詩刊眾多的情況；林淑貞：〈覃子豪在台之詩論及其實踐活動探究〉亦將「藍星」眾多刊物作了表列及介紹，見《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四期，1991年11月。

¹¹ 見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頁229。

現代詩運動在五十年代後期的開展與推進，主要是經由三場現代詩論戰來完成的。沒有現代詩論戰的直接激發所造成的宣傳效果，現代詩運動也就無法勢如破竹的向前進行。這三場論戰，一般可根據論戰的雙方和論戰的主題，再細部的歸納為：

- (一)「現代派」和「藍星」的「現代主義論戰」
- (二)成大教授蘇雪林和「藍星」覃子豪的「象徵主義論戰」
- (三)專欄作家言曦和以「藍星」詩人余光中為應戰主力的「新詩論戰」

在這三場論戰中，第一場是屬於詩壇內部的論爭，第二、三場則是來自詩壇外部對新詩的批評¹²。不論槍口是向內或向外，三場論戰都全程參與的是「藍星」詩人，並成為強有力的開火及應戰的一方，前兩場由覃子豪掛帥，後一場有余光中壓軸，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關鍵存在。此處將探討「藍星」詩社在三場論戰中的角色扮演，以了解其對現代詩發展的貢獻。

(一)「現代派」與「藍星」的「現代主義論戰」

現代詩論戰的第一場，起自詩社之間對彼此詩見的不認同。「藍星」詩人覃子豪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藍星詩選》獅子星座號發表「新詩向何處去」一文，反駁一九五六年二月紀弦在《現代詩》提出的現代派信條與釋義，引發了「現代派」和「藍星」雙方對於現代詩的爭論，是為「現代主義論戰」。

覃子豪質疑紀弦所謂「橫的移植」說，認為台灣社會並未達到現代化的水準，缺乏誕生自歐美發達工業文明的現代主義生長之土壤，若原封不動移植外來文化，自己將無處植根，成為脫離現實生活的現代西洋詩之空洞摹擬。同時他也反對將抒情驅逐於詩的領域之外，使詩變成純理性思考的哲學，並提出六點意見作為新詩創作方向的原則，其中最主要的意見是希望詩人不要故作曖昧難懂，應考

¹² 本文對於「新詩」和「現代詩」運用的概念是，「新詩」一詞相對於中國傳統的舊詩，乃泛指五四白話詩以降的新詩，「現代詩」則是受西方現代主義觀念、技法影響而創作的詩，在台灣，是用來指稱五十年代「新詩再革命」口號下，接受現代主義創新觀念而不因襲傳統的新詩創作。因此，現代詩是新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風潮和階段。本文為了不同的行文需要，有時會將兩者通用。

慮讀者的感受與理解力。也不要追求新奇而失去準確的表現，以及一味步學西洋，卻無法建立民族自我風格¹³。

這樣的論調，在大力鼓吹現代詩的紀弦看來，自有保守和誤解之處，於是紀弦在《現代詩》十九期發表了〈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強調「現代派」並未照單全收西方的文化，而是有所選擇，提倡一種革新的、健康的、積極的「新現代主義」，正可作為「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大步邁進中的中國社會之一精神上的前導力量」。至於唾棄抒情主義而強調知性，是為了避免新詩再度落入浪漫主義喜怒哀樂的情緒告白，無法徹底的進步與現代化。他認為覃子豪不新不舊的思考是「折衷主義」，不能為詩壇帶來有力的革新，並解釋所謂「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是基於史實考察而言，因為新詩不屬於唐詩宋詞等中國傳統的「國粹」，而是深受西洋詩影響的「移植之花」，但是新詩發展到今天已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份，並沒有脫離和拋棄中國傳統¹⁴。

「新詩是橫的移植」的主張，的確是紀弦最容易引人誤會和攻擊的地方，因此林亨泰也在《現代詩》二十期發表了〈中國詩的傳統〉，強調「現代派」是新的開拓也是傳統的繼承，現代主義即中國主義。他認為中國詩的傳統在本質上是象徵主義（借此而喻彼），在文字上是立體主義（象形的特性），與西方現代主義的象徵技巧和圖像符號詩的運用原理有共通之處，這是試圖從兩種文化特性的相似處來作連結，以證明現代主義並未與中國傳統不相容。林亨泰長於理論和符號詩、圖像詩的創作，在《現代詩》十七、十八期發表過〈關於現代派和符號論〉二文，屬於「現代派」中立體主義的倡導者，是紀弦在現代詩論戰中的好幫手。

然後紀弦以〈對於所謂六原則之批判〉來回覆覃子豪提出的六點意見，除指其陳義不夠明確，又再次聲明「現代派」的主張，在過去是以提倡自由詩來取代新月派的格律詩，謀求表現形式的革新；現在則要提倡現代詩，以表現手法的革新為努力的目標，不為遷就讀者而降低詩的標準，反應藉此提高讀者的程度¹⁵。

¹³ 見覃子豪：〈新詩向何處去〉，收於何欣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台北：天視出版社，1979年。

¹⁴ 紀弦：〈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現代詩》十九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¹⁵ 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和紀弦〈對於所謂六原則之批判〉（代社論），均發表於《現代詩》二十期，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

在「藍星」這邊，有羅門 論詩的理性與抒情、黃用 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 二文，繼續質疑紀弦提倡的現代主義之淵源和主知等問題，而「現代派」仍由紀弦、林亨泰應戰。紀弦將林亨泰寫給他的信摘錄成 談主知與抒情 一文，說明並非要詩拋去一切抒情，只是要將抒情置於主知之後，以主知為優位性。紀弦自己則寫了 兩個事實、多餘的困惑及其他，前批覃子豪後答黃用，再三強調「現代派」所追求的現代主義是包容法、英、美的流派而又有所超越的獨創，絕非僅是超現實、象徵或菁粕不分的盲目接收¹⁶。這裡顯示了外來思潮在面臨傳統勢力的挑戰時，必須經由不斷的申辯與自我釐清來進行觀念的推展，才能達到傳播和影響的目的。

接著覃子豪又在《筆匯》發表 關於「新現代主義」，除質疑「現代派」包容了許多對立理論的詩派，難以使各詩派的精神與要素取得協調，又指「現代派」的主張不夠具體，錯誤在於「沒有從象徵派以降的許多新興詩派中去整理出一個新的秩序，把握時代的特質，創造一個更新的法則，作為前進的道路。」紀弦也於《筆匯》回以 六點答覆，指出一切新興詩派雖各有理論特徵，但仍有共通點，即以「否定了那種感情的告白與觀念的直陳、唾棄浪漫主義、反傳統，和追求新的表現」為一致趨向，亦即各詩派可取得協調之大前提。他又指出「現代派」偏重象徵主義，而與達達主義、立體詩和超現實主義保持距離，這種有所取捨的態度就是「現代派」所整理出的新秩序¹⁷。而論戰進行至此，已有觀點重複與意氣之口吻出現。

另一位「藍星」詩人余光中，也忍不住發表了 兩點矛盾 於《藍星周刊》，主要是為紀弦所排斥的格律詩和抒情主義作辯護，紀弦則與林亨泰分別以 一個陳腐的問題 和 鹹味的詩 反駁其說。紀弦之文和余光中之間已涉及人身攻擊，林亨泰則簡潔說明主知與抒情是質的序位關係，而非量的並列關係。兩文刊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現代詩》第二十二期，現代主義論戰在此終於告一段落。

基本上，「藍星」是站在傳統和抒情的立場批判「現代派」的西化和主知路

¹⁶ 林亨泰與紀弦這三篇文章，以代社論一、二、三的形式發表，見《現代詩》二十一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

¹⁷ 覃子豪和紀弦這兩篇文章，分別刊登於《筆匯》二十一和二十四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和四月十六日。覃文收入何欣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紀文收入《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1970年。

線，對「現代派」的鋒頭與部分論點有遏抑與牽制的作用，詩壇革新誠然需要如紀弦這般全新的主張作號召，但是也需要有人對全新的主張不斷檢討和質疑，才不致造成偏頗太過的缺失。不過「藍星」詩人經此論戰之後，無形中都接受了現代主義的洗禮，開始創作現代詩，他們曾經批判過的現代詩的難懂問題，也轉而由詩壇外部的人士接手來砲轟新詩人了。就在「現代派」聲勢逐漸減弱之際，「藍星」由於出版和發表作品的刊物眾多，勢力大為擴張，便取代「現代派」在第二、三場由詩壇外部挑起的論戰中挺身而出，成為護衛詩壇最力者。

（二）蘇雪林和「藍星」詩人覃子豪的「象徵主義論戰」

第二場論戰在半年後展開，由成大教授蘇雪林和「藍星」詩人覃子豪以《自由青年》為論戰場域進行交鋒。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蘇雪林在「文壇話舊」的單元，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評論以李金髮為代表的象徵詩派，並有感於《自由青年》詩選欄所刊出的青年學生作品，受到李金髮象徵主義的影響，造句不講文法，內容晦澀曖昧，有如蠱詞咒語般無法理解。未料引起覃子豪為文答辯，寫下〈論象徵派與中國新詩 兼致蘇雪林先生〉，說明象徵派的貢獻在於超越了創造社與新月派的表現方式，而且台灣新詩的傳承不是只有象徵派，而是接受無數新影響而兼容並蓄的綜合創造。因為接受現代主義的技法而以暗示、雙關語的應用為表現方式，雖然難解，卻提高了詩的思想與境界。不難看出這樣的論調與紀弦是相似的，可見覃子豪已拋棄他的「折衷主義」而傾向「現代派」的主張了。

隨後蘇雪林又寫了〈為象徵詩體的爭論敬告覃子豪先生〉，文中頗不以象徵派為新月派的超越為然，並說她反對的是沒有實學、故弄玄虛模仿李金髮的「偽象徵詩派」，使青年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覃回以〈簡論馬拉美、徐志摩、李金髮及其他〉，認為當前一些讀者和批評家對詩的觀念，還停留在新月派的時代，所以他詳細的說明了新月派到最後何以形成如創造社般的濫調，必須靠象徵派乃至現代派以新穎的意象來超越¹⁸，蘇雪林則致信編者表示不再回應。基本上兩人交鋒的準頭各有所偏，覃子豪看重的是象徵派對現代詩的貢獻，蘇雪林則著眼於象徵派

¹⁸ 蘇雪林與覃子豪四篇論戰文章，分刊《自由青年》二十二卷一期、三期、四期、五期，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八月一日、八月十六日、九月一日。

的流弊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陷於各說各話的狀態。

後來有署名「門外漢」的讀者，寫了〈也談目前台灣新詩〉加入蘇雪林一方，以胡適也不主張青年趕時髦、學習現代主義為例，要求新詩「平易近人、老嫗能解」，新詩人應「走到群眾之間來」¹⁹。覃子豪以〈論詩的創作與欣賞〉作覆，認為詩人要體驗群眾的生活、表達嶄新的人生境界，不可遷就迎合讀者，否則便是「退回白話詩的時代」，他並建議對讀者加強新詩教育。覃子豪這個「新詩不應遷就讀者」的主張，已經與第一場現代主義論戰時的堅持完全相反了，這也是他受到現代主義影響的又一證明。接著門外漢回敬以〈再談目前台灣新詩〉，認為新詩的讀者少，是由於新詩拒絕讀者，不是讀者拒絕新詩，新詩的難懂在於詩人文字表現上的失敗，要詩人「提高本身運用文字媒介的能力，改正『寫詩必須使人不懂』的觀念」，不要自以為是，使新詩日漸脫離讀者大眾²⁰。這種看法其實類似覃子豪最初對現代詩的批判（見〈新詩向何處去〉），但覃既已加入現代詩的陣營，自然會站在詩人的立場，轉而要求讀者「進步」。最後覃致信編者，聲明休兵，並撰寫〈現代中國新詩的特質〉發表於《文學雜誌》，提供更多作為了解新詩的參考。歷時五個月的論戰，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結束。

這次以李金髮為導火線的「象徵主義論戰」，本來是批評《自由青年》上「不成熟」的青年詩作，為何引起覃子豪的長文答辯呢？《自由青年》是國民黨所創辦的刊物，旨在教育青年，而且讀者和投稿人多以學生和軍人為主，文藝作品所佔的比例很高，更闢有「新詩園地」專欄，邀請當時著名的詩人擔任選輯人，紀弦、葉泥、羅門、蓉子、夏菁等「現代派」與「藍星」詩人，都曾負責過分期的選輯任務，覃子豪亦主編過此詩選欄，他們所挑選的青年作品，也必然會以傾向

¹⁹ 此處所引的胡適意見，應出自胡適在《大學生活》五卷三期上對當時流行的現代詩的看法。胡適說：「我勸你們千萬不要學時髦，那些偏重抽象的意念而不重理解的所謂『現代主義』的新詩，都不是寫詩的正路。文學的要素有三：第一要清楚明晰，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有美感。其實總括說，不管寫詩或其他的文學作品，最要緊的就是第一點——清楚明晰，因為寫文章能做到清楚明晰，就是有力，而一篇文章有力就是美。如果寫出來的東西含糊不清，或無從理解，則第二、三兩項要素也難以做到。所以寫詩還是要求其平易動人，老嫗都解，才是好詩。」胡適之所以不贊成學習現代主義，乃是受到他自己在白話文運動中主張的平易、淺白的文學表達觀念所限，因此不能了解現代主義在中國文學發展上的價值。後來端木虹在〈與胡適博士談現代主義〉一文中，就指出了胡適的侷限並說明了現代主義的價值，見《筆匯》革新號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

²⁰ 覃子豪與門外漢的辯論，門外漢二文見《自由青年》二十二卷六期、八期，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十月十六日。覃文見《自由青年》二十二卷七期，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現代詩的風格為主。這些作品既然受到批評，身為選輯人的詩人自感面臨挑戰，而不能保持沉默。在《自由青年》上進行論戰，等於向青年學生介紹現代詩，辯正外界對新詩的誤解，並試圖消解一般讀者的疑慮。

不過平心而論，這次論戰的雙方分別以「讀者」和「詩人」的立場各持己見，最後難免以互相譏諷的口吻收場，因此沒有太多的交集。詩人認為他們的作品是超越了五四以來的全新創造，讀者則認為詩人閉門造車，與廣大群眾脫節。詩人固然有其創作上的用心和成績，但現代詩無明確章法，導致青年在學習和表現上的盲目混亂，也是事實，至於偽詩充斥更是無法避免。而且現代詩的意象與造境確實比較抽象，重表現不重抒情，一般習於抒情的讀者自是不易領略。如果詩人表現太過，與讀者之間的隔膜也就愈來愈深，這的確是現代詩潛藏的危機，並持續在詩人與讀者之間進行著辯證的拉鋸。

（三）以「藍星」詩人余光中為應戰主力的「新詩論戰」

第三場論戰也是來自詩壇外部的批評，繼續質疑新詩的「不通」與「難懂」，可以說是蘇雪林觀點的延續，而且捲入的媒體和參與論戰的人更多，所引起的注意遠超過第二場「象徵主義論戰」。雖然參加討論的人數眾多，但大致可視為「讀者代表」言曦（邱楠）與「詩人代表」余光中的對壘，言曦的發言媒體為《中央日報》，余光中則以《文星》為主要的論戰場域，兩人一來一往總共進行了四回合的辯論，並吸引許多對新詩感興趣的學者、年輕學生或新詩創作者加入討論，提出正反兩面不同的意見，掀起了一股討論新詩的熱潮。

第一回合始於專欄作家言曦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起，連續三天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新詩閒話」，抨擊新詩的不通與難懂。他以「歌與誦」、「隔與露」、「奇與正」、「辨與從」為標題，分談新詩的協律、造境、琢句與表現方式的問題，主要在於批評現代詩因不可歌（不重協律）而失去傳誦的感染力，或強以艱澀字句掩飾貧乏的詩境（造境欠佳），或不循常規雕琢出奇怪費解的句子（琢句失真），使得詩與讀者的距離愈來愈遠，因此詩人應該自我檢討²¹。言曦所依據的評論標準當然還是中國的舊詩詞，他的意見可能代表了大多數想了解新詩、卻苦

²¹ 原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後收於何欣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台北：天視出版社，1979年。

於「看不懂」的一般讀者的看法²²。

新詩人經此一激，首先跳出來應戰的是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了〈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以仙人掌的多刺比喻新詩（現代詩）的不討喜，澄清外界對現代詩的一些偏差觀念。例如余光中指出現代詩的傳承並非僅限於象徵派，它不是象徵派的餘波而是廣闊的現代文藝之一環，是整個價值觀念和美學原則的全面改變，是中國新詩繼五四白話詩之後的進步。它重視抽象美與知性的觀察，以挖掘潛意識和自我存在之覺醒為表現目的，而不純作感情的發洩。它的不入樂不可歌，正可引導讀者轉而品察詩的內容所蘊涵的思想性，讀者應該提高對新詩的鑑賞力，而非要詩人去遷就大眾²³。撇開此文對言曦一些誤解的論述，大致上頗能對外闡明現代詩的源流與價值所在，故得到虞君質在十二月三十日《台灣新生報》以〈談新藝術〉一文呼應。余光中似覺陳述未能盡興，又藉《文星》二十七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出刊）的「詩的問題研究專號」²⁴，再次為文申論。專號中由「藍星」詩人余光中、黃用、夏菁、覃子豪執筆一系列專論新詩的文章，還有其他學者發表對新詩的意見，共計八篇詩論。

在此專號中，余光中介紹了封面人物——美國現代派詩人艾略特，而其他關於答辯的論戰文章，則主要由「藍星」詩社的菁英操刀，例如有余光中談新詩與傳統的關係、黃用專論新詩的難懂問題、夏菁比較五四與現代新詩的不同，覃子豪則談新詩的因襲與創造問題。余光中指出新詩常用的倒裝和變更詞性的句法，舊詩詞中也有，而且新詩人善於援用舊詩典故入詩，所以與中國傳統並未脫節，

²² 此語是根據孺洪「閒話」的閒話中的一段記載：「日前文友聚會，座中有『文學雜誌』的發行人，有『文星』的主編，也有『不薄新詩愛舊詩』的名詩人，不期而然談到這場論爭，某作家謂言曦先生可謂之為『外行的代表』，並解釋說：『這並不是指言曦對於談詩是外行，而是說言曦的新詩閒話，說盡了想讀詩而每苦於不得其解的人，心裡所想說的話。』此語有很多人同意……」見《中華日報》副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²³ 余光中：〈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文學雜誌》七卷四期，一九五九年十二月，頁26至32。

²⁴ 以「提倡新文學、傳播新思潮」著稱的《文星》，創刊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最初由何凡、林海音、陳立峰擔任主編。在第三場現代詩論戰中，《文星》成為「藍星」詩人反擊的大本營，從二十七期以「詩的問題研究專號」開端，到三十期為止，一連四期刊出新詩辯難的文章。在二十七期最後的「編輯室報告」中，可以看到《文星》希望藉新詩問題的討論來刺激台灣文壇：「《文星》之所以選擇『詩』這個問題來作專題研究，是因為覺得詩的興廢與文化的盛衰息息相關。……台灣文壇最近掀起新舊詩體的辯論。既然有辯論，必有其所以發生辯論的因素。如果大家認真地把問題攤開來痛快地談談，也可以多少幫助一般人對新舊詩體的了解，這對沉悶的台灣文壇未始無益。……倘若因為這一討論，而引發讀者對詩歌研究的興趣，那就不負執筆諸先生的熱忱了。」在當時封閉的思想言論環境下，文壇上大規模的論戰確實有助於打破沉悶的空氣，達成思想的刺激與傳播目的，現代詩論戰的高潮亦與《文星》的推動有密切關係。

雖然吸收西洋技巧，但仍是融合中西之後的「中國新詩」。黃用分析了一般人所謂「看不懂」的詩句，要求讀者提高鑑賞力，很有現身說法的意味。他強調今日的新詩必須超越「老嫗都解」的白話詩，是境界的表現而非意義的說明，否則便與應用文、宣傳標語和流行歌曲無異了。至於夏菁和覃子豪，都以五四時期的新詩作品和當時的現代詩作比較，更詳細的說明現代詩人欲揚棄的陳腐情緒與表現技巧，以達到創新的目的。另外還有盛成、張隆延、黃純仁、陳紹鵬談詩的文章，既不厚古亦不薄今，態度較為客觀²⁵。

很顯然的，新詩人是以超越五四淺薄的白話詩、浪漫的抒情詩和刻板的格律詩為進一步的創造，同時要擺脫因循的情感和句法，自鑄新詞以傳達全新的現代感受，有時造句不免太過新穎，超出了一般讀者習慣的文法邏輯，因此會有「不通」之病，尤其是對新詩的印象多數還停留在五四程度的人們，特別感到難以接受。加上當時確有不少故弄玄虛的「偽現代詩」出現，使得傳統學者和文人如蘇雪林、言曦，紛紛對於此種亂象予以批判。而《文星》「詩的問題研究專號」的製作，讓詩人有機會解釋他們的創作企圖與技法，釐清現代詩令人誤解的問題，的確有助於一般讀者對新詩的了解。

接著第二回合由言曦展開反擊，於《中央日報》寫了「新詩餘談」四篇，分以「辯與辨」、「悟與誤」、「進與退」、「愛與恨」為題²⁶，針對余光中、黃用、覃子豪等人的意見作回覆。除了認為現代派的藝術未必優於新月派，他堅信現代詩的創作仍不脫造境、琢句與協律三要件，並指出為追求絕對的解放，將最低限度的琢句與協律原則都打破，卻不見得產生新的造境，反而會令讀者不知所云。他還認為後人難以造出前人全未談過的新境，卻要用奇字拗句來掩飾，其實並無新意。最後他指出讀者的智力不可能提升到詩人所需要的狀態，現代詩若沒有讀者即沒有生命，詩人與人群脫節，最後只能與社會及一切組織敵對，更要畫地自限了。這最後的結論和《自由青年》門外漢的意見相同，也可以看到詩人對表現技巧的堅持，認為若缺少「表現」則會使詩流於白話般的淺薄，而讀者則感到詩人

²⁵ 余光中「新詩與傳統」、黃用「論新詩的難懂」、夏菁「以詩論詩」從實例比較五四與現代的新詩、覃子豪「從實例論因襲與獨創」、陳紹鵬「略論新詩的來龍去脈」、盛成「談詩」、張隆延「不薄今人愛古人」、黃純仁「舊詩的興衰及其趨勢」，見《文星》第二十七期「詩的問題研究專號」，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²⁶ 見《中央日報》一九六一年一月八日至十一日。

的「表現」無章法可尋，難以理解，引不起情感的共鳴。雙方各說各話，仍是不肯各退一步，在孺洪（高陽）為文指出現代詩更像哲學作品，而且「陳義太高，想像上脫略不羈，以致理論上似乎還未發展成熟」，並期望余光中可在此方面再做努力時²⁷，《文星》二十八期很快就刊出了回應文章。

余光中於《文星》二十八期和黃用分別為文回敬，余寫了「摸象與畫虎」、黃以「從摸象說起」緊接在後，大有指言曦、孺洪等對新詩的議論為盲人摸象之意。兩文一再申論新詩的反傳統是反對直抒胸臆的情感表達、反對陳腔濫調和習慣性的品味，所以必須出之以新的創造，並非要與社會對立脫節。在兩人看來，言曦和孺洪無異是擺脫不了舊式品味的「崇古派」，因此無法接受和欣賞新詩人的表現方式。其實兩方的意見由於立場各異和堅持己見之故，都免不了將對方的意思斷章取義或過度曲解，於是又像前次的象徵主義論戰一樣，流於頗有火藥味的互相譏諷。在余、黃之外，還有李素的「一個詩迷的外行話」，以古今皆愛的詩迷自居，提出持平之論，希望新詩人在努力創作之餘，要多討論分析有關詩的問題，引導青年走向創作的正途。而詩人白萩、張默也在同月《創世紀》十四期上反駁言曦之見²⁸，一時之間戰況甚為激烈，並掀起新詩討論的高潮。

由於讀者反應熱烈²⁹，所以《文星》在二十九期繼續刊載學者和詩人對新詩的意見，有陳紹鵬「由閒話談到摸象」、陳慧「有關新詩的一些意見——從言、余二先生的辯論說起」、孔東方「新詩的質疑」，三文都算是相當中肯之見，既肯定新詩人在創作上的成績，又指出余、黃等人過度解釋的偏差。陳紹鵬認為詩人求新表現很好，但仍需注意句法用詞是否合理恰當。陳慧則探討新詩是否必須「可歌」及「大眾化」的問題，基本上他認為可不可歌並非決定詩的好壞之標準，而大眾化也不一定會使詩的格調降低，新詩人對這兩點的反應似顯極端。孔東方揭示了新詩無健全理論指引的缺失，並認為現代詩所表現的「感覺」若喚不起大眾的經驗與意念，亦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孔東方和陳紹鵬還特別針

²⁷ 孺洪，「閒話」的閒話，《中華日報》副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此文分四天刊出，此句為最後一篇的結論。

²⁸ 白萩「從新詩閒話到新詩餘談」、張默「現代詩藝術的潛在面」，均見《創世紀》十四期，一九六二年二月。

²⁹ 《文星》第二十九期「編輯室報告」說：「自從上兩期出版以後，不僅在文學界激起研究新詩問題的高潮，甚至也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於是繼續進行有關新詩的討論，見《文星》二十九期，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頁40。

對現代詩中的圖像實驗技法，認為詩若標榜繪畫性，則易墮入立體和形式主義的弊端。當時還是師大學生的吳怡，也在《自由青年》發表〈灌溉這株多刺的仙人掌〉，希望新詩人能夠勇於接受批評，在反省中更求進步³⁰。

第三回合是言曦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的《中央日報》發表〈詩與青年〉，憂慮新詩反理性、反文法的傾向可能會影響語文教育。於是余光中又繼續在《文星》三十期上，以〈摸象與捫蝨〉回覆言曦與前述陳紹鵬、陳慧的意見。他以嘲諷口吻比喻這些枝節性的問題與「捫蝨」無異，認為藝術創作本不需受限於理性與道德準則，讀新詩也未必會降低青年的國文程度，但此文對陳、言等人的意見頗有誤解之處。同期還有錢歌川介紹英國新詩人溫約翰的詩，指其形式完整、表現明確又具智慧之美，可供國人借鑑。陳慧則秉持客觀態度，再進一文釐清現代詩的定義及表現技巧上的特色，加強讀者的理解³¹。

這些文章引來第四回合言曦在四月十日和十一日的《中央日報》以〈詩與陣營〉、〈詩與頹廢〉二文作覆，批評余光中而贊同錢歌川與陳慧。接著「藍星」由夏菁在《自由青年》二十三卷八期（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出刊），發表〈詩與想像力〉一文，將言曦、陳紹鵬、吳怡所列舉的看不懂或不通的新詩，加以分析解釋，作為賞析現代詩之示範，同期還有張明仁的〈畫鬼者流〉以悔改者的身分勸青年不要誤入現代詩的歧途，恰與夏文形成對照組。另外，紀弦也在《藍星詩頁》寫下〈表明我的立場〉，聲援現代詩。五月三日《聯合報》有李思凡〈新詩辯論旁聽記〉記述了論戰始末，為浩浩蕩蕩的「新詩論戰」劃下休止符。

在三場論戰之中，這是規模、聲勢和影響力最大的一場論戰，由於參與的媒體多，主要的《中央日報》和《文星》又都是當時知名的媒體，較易凝聚眾人的目光。「藍星」詩人覃子豪、余光中、黃用和夏菁，站在現代主義的創作觀點上，全力捍衛飽受攻擊的新詩，「一個外行人的幾句閒話，引起他們跳出來細說新詩歷史、賞析詩句，甚至提示創作方法，這一場論戰，因此可以說是新詩教育的推廣」³²。而《文星》在此次論戰中與「藍星」詩人結盟，也巧妙的成為推動現代詩的

³⁰ 見吳怡：〈灌溉這株多刺的仙人掌〉，《自由青年》二十三卷五期，一九六〇年三月一日。

³¹ 錢歌川〈英國新詩人的詩〉、陳慧〈現代派及其他〉與余光中〈摸象與捫蝨〉俱見《文星》三十期，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

³² 見蕭蕭：〈五〇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收入《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年，頁119。

力量，關鍵人物當為余光中。他把論戰場域擴大到比專業詩刊更具普及性的《文星》和《文學雜誌》，自然是因為他主編過這兩份刊物的詩選欄，也因此促成「藍星」與《文學雜誌》和《文星》共通的作者群與新詩品味。余光中說：「在那次論戰的開始，藍星詩人並不是遭受攻擊的主要對象，可是奮起守衛第一線的，大半是藍星詩人，因為那時，藍星作者能發表文章的刊物很多，也確實舉得起幾枝能言善辯的筆。」³³可以看到「藍星」發言媒體眾多的優勢，在現代詩論戰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藍星」在論戰中扮演的角色

來自詩壇外部的批評聲浪，直接促使了現代詩人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紀弦本來與「藍星」對立，但在論戰最後，與「藍星」站在同一陣線；「藍星」本來反對紀弦的部分主張，經過兩場新詩的保衛戰後，也無形中向現代詩靠攏。整體來看，「藍星」詩人確實是現代詩論戰中最賣力的演出者，他們至少扮演了三種角色，對現代詩的發展作了貢獻：

1. 現代主義的反思者：現代詩運動由紀弦的「現代派」為開路先鋒，「現代派信條」的揭示，雖然有領航與改造詩壇的用意，但是其口號式的宣言過於簡略，容易造成誤解，其中西化與主知的主張也令人有矯枉過正的疑慮，因此「藍星」詩人與「現代派」展開論戰，對現代主義提出質疑，扮演了現代主義的反思者的角色，使雙方都可以經由論戰產生良性互動，保有思考空間而達到互為影響的效果，不至於陷入對現代主義過分盲目、毫無選擇的追求³⁴。

2. 新詩園地的開拓家：「藍星」的自由風氣，以及廣為向外開闢新詩園地的作風，使他們有許多不限專業詩刊的雜誌可發表作品，成為新詩園地的開拓家。尤其是余光中與《文學雜誌》、《文星》的結盟，使「藍星」詩人的作品成為兩刊的常客，

³³ 見余光中：《第十七個誕辰》，《焚鶴人》，頁197。

³⁴ 趙小琪在《藍星詩社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一文的分析指出，藍星詩社接受現代主義有明顯的局限性，即在其對「全面性」和「平衡性」的過分強調，但也因此抑制了台灣現代詩運動發展初期的片面化傾向，促使現代詩向著更為全面的方向發展，為台灣現代詩的現代性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堅實基礎。見《藍星詩學》季刊13-14期，2002年3月、6月，頁187-188。

提高了對外界的曝光率。在現代詩論戰時，余光中也能夠利用兩刊的版面為論述場域，使得論戰效應廣為擴大³⁵，促進詩壇內外部對新詩的關注與交流。

3. 現代詩觀的推廣員：面對詩壇外部人士對新詩晦澀難懂的批評，「藍星」詩人充當了第一線的護衛，從覃子豪迎戰蘇雪林對新詩的批評，到最後一場躍上大媒體、由余光中為主力反擊的新詩論戰，「藍星」詩人努力向大眾解說現代詩的源流、觀念和價值，儼然現代詩觀的推廣員，不但有助外界對新詩發展的了解，而且也堅定詩人本身對現代詩的信念，在創作上做自我反省與提昇。

「藍星」詩人的三種角色扮演，在現代詩論戰進行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同的階段性功能：初期對現代詩觀念的反思質疑，起到了牽制鎮靜的作用；中後期又憑藉媒體優勢，為現代詩進行宣傳解說，起到了擴大推廣的作用。雖然「藍星」詩社不如「現代派」和「創世紀」詩社在現代詩運動中的領導位置鮮明，但在現代詩的發展里程上，自有不容忽視的貢獻及影響。

四、結論

「藍星」詩社和「現代派」、「創世紀」詩社並列為台灣現代詩運動的三大勁旅，在現代詩的推動上，「藍星」詩社最主要的著力處在於現代詩論戰的表現。以覃子豪為首發起組織的「藍星」詩社，本無統一宗旨和明確主張，自由創作是其特色。「現代派」的六大信條提出之後，「藍星」首先發出質疑，與「現代派」紀弦展開一場西化、傳統、主知、抒情的論戰，對「現代派」的主張發揮良性制衡的作用。

隨著現代詩的蔚為潮流，詩壇外部人士對新詩的走向亦群起批評，蘇雪林和言曦的批判意見，掀起了第二、第三場論戰的序幕。他們多半仍循舊詩和五四新詩的美學標準，指責現代詩的表義晦澀和文句不通，造成新詩的難懂以及與大眾

³⁵ 應鳳凰《台灣五〇年代詩壇與現代詩運動》亦肯定「藍星」在現代詩運動中「決不僅具備『修正』功能而已，它的驍勇善戰，幾枝健筆加上擁有如《文星》等重要媒體的刊登地盤，實際上推展並深化了現代詩運動的深度與廣度，也因此突顯現代詩的合法性，爭取詩壇藝術自主時，也同時為現代詩運動的開展立下汗馬功勞。」見《現代詩學》季刊 38-39 期，2002 年 3、6 月，頁 101。

脫節。「藍星」詩人奮起衛戰，一面努力解釋現代主義怎樣為詩人所消化改良，變成超越舊詩和五四美學的新創造，一面「教導」大眾怎麼欣賞現代詩；至此「藍星」詩社已由對現代詩的質疑轉而為接受現代詩，並憑其發言刊物眾多的條件，全力護衛和宣傳現代詩，無形中助成與加速了現代詩的推行。

儘管論戰中的詩人觀點也不乏偏頗或耽溺之見，現代詩的流弊所及，也確有脫離傳統、脫離現實、晦澀難解等問題，但是現代詩的提倡，對台灣文學的藝術提昇和創造方面仍具重要價值。從「藍星」詩社在論戰中的角色扮演及功能發揮，可以了解「藍星」詩社對台灣現代詩發展的貢獻所在，讓我們更細緻的看到現代詩運動在初期的進行方式與推展過程。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文訊雜誌社編《台灣現代詩史論》，台北：文訊雜誌社，1996年。
- 余光中《焚鶴人》，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2年。
- 何欣編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台北：天視出版社，1979年。
- 林亨泰《找尋現代詩的原點》，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
- 紀弦《紀弦論現代詩》，台中：藍燈出版社，1970年。
- 麥穗《詩空的雲煙：台灣新詩備忘錄》，台北：詩藝文出版社，1998年。
- 舒蘭《中國新詩史話》1-4冊，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8年。
-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台北：天下文化公司，1999年。
- 葛賢寧 上官予編著《五十年來的中國詩歌》，台北：正中書局，1992年。
- 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

二、報紙 雜誌與期刊論文

- 文星雜誌編輯委員會主編《文星》第27-30期，台北：文星雜誌社，1960年1月-4月。
- 向明 現代詩史與藍星詩社，《笠》115期，1983年6月。
- 自由青年社主編《自由青年》22卷1-8期，23卷5期，台北：自由青年社，1959年7月-1960年3月。
- 余光中 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文學雜誌》7卷4期，台北：文學雜誌社，1959年12月。
- 言曦 新詩餘談、詩與青年，《中央日報》副刊，1960年1月8-11日，3月5日。
- 林淇瀆 五十年代台灣現代詩風潮試論，《靜宜人文學報》11期，1999年7月。
- 林淑貞 覃子豪在台之詩論及其實踐活動探究，《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四期，1991年11月。
- 洛夫 詩壇春秋三十年，《中外文學》第10卷第12期，1982年5月。
- 紀弦主編《現代詩》13-15期，19-21期，台北：現代詩社，1956年2月-1958年

3月。

覃子豪主編《藍星周刊》創刊號刊前語，原見《公論報》副刊，1954年6月17日，收錄於《文訊》12期，1984年6月。

趙小琪 藍星詩社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上）（下），《藍星詩學》季刊13-14期，2002年3月、6月。

端木虹 與胡適博士談現代主義，〈筆匯〉革新號1卷3期，1959年7月。

孺洪 「閒話」的閒話，〈中華日報〉副刊，1960年1月11-14日。

應鳳凰 台灣五十年代詩壇與現代詩運動（上）（下），《現代詩學》季刊38-39期，2002年3、6月。

The Contribution of Blue Star Poetry Un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Poetry Case Study of Three Debates in 1950s

Hou, Tzuoh-Jen

Abstract

‘Blue Star’, ‘Modernist’, and ‘Epoch’ poetry unions are three major force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Poetry in Taiwan, and are the participants in Modernist Poetry Movement.

From 1956 to 1969, there were two events about the Modernist Poetry Movement which attempted to achieve reformation in thought and artistry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n, by advocating Modernist Poetry. The former is the ‘Six major points of Modern School’ declared by Ji Xuan; the latter is the experiment of Surrealism mode by ‘Epoch’ poetry union.

The three debates over the Modernist Poetry occurred between 1957 and 1960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Poetry, during which ‘Blue Star’ played a critical ro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that ‘Blue Star’ played in the debates to discuss its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st Poetry.

Keywords : Modernist Poetry(現代詩) , Blue Star Poetry Union(藍星詩社) , The Debates of Modernist Poetry(現代詩論戰) , Modernism(現代主義)